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中国经学学术编年（第八卷）

主编 郑杰文

杨峰 张伟 著

清代经学学术编年

上

凤凰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中国经学学术编年（第八卷）

主编 郑杰文

杨峰
张伟 著

清代经学学术编年①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清代经学学术编年 / 杨峰, 张伟著. --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5. 7

(中国经学学术编年 / 郑杰文主编)

ISBN 978-7-5506-2121-3

I. ①清… II. ①杨… ②张… III. ①经学—学术研究—中国—清代 IV. ①Z126.2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15021号

- | | |
|---------|---|
| 书 名 | 清代经学学术编年 |
| 著 者 | 杨峰 张伟 |
| 责 任 编 辑 | 林日波 |
| 出 版 发 行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25-83223462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fhcbbs.com |
| 经 销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照 排 |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
| 印 刷 |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南通市通州经济开发区朝霞路180号, 邮编:226300 |
| 开 本 | 880×1230毫米 1/32 |
| 印 张 | 35.25 |
| 字 数 | 949千字 |
| 版 次 |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
| 标 准 书 号 | ISBN 978-7-5506-2121-3 |
| 定 价 | 220.00元(全二册) |
-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0513-80237871)

本成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儒学学科建设”（批号09AZD051）
最终成果之一

本成果为山东大学“985”二期工程资助项目成果之一

总 序

儒家思想体系的形成肇始于周公制礼作乐，经后人发挥、补充而反映在儒家早期原典中。这类儒家早期“经典著述”，到孔子传学时已有“六经”（即《易》、《书》、《诗》、《礼》、《乐》、《春秋》），秦汉间“乐经”亡佚而剩“五经”。汉武帝“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使广大学子对传承、阐释、发挥儒家经典趋之若鹜，出现了数量众多的经学著述。经学著述所承载的经学成为历代王朝的主导学术，经汉学、宋学（理学）、清学（朴学）等发展阶段，留下了数以千计的注经、说经乃至改经的著述（如《中国丛书综录》即收此类著述 7646 种）；20 世纪的一些中国学人继续从事此类研究，出现了数以千计的经学论著和数以万计的经学论文（参见林庆彰等《经学研究论著目录》各编）；研究汉学的国外学者如日本学者也多涉此而留下数量众多的著述（参见林庆彰等《日本研究经学论著目录》），经学研究从而成为中国学术史乃至世界学术史上最为重要的学术研究门类之一。可以说，不了解中国经学的发展变化史，就难以真实把握历代封建王朝的政治思想和统治方略，就难以深刻认识历代文人的学术思想和文化品格，就难以切实了解中华民族的性格品质和文化风俗。

中国经学史的专门研究最迟从明代就开始了（如明人朱睦㮮有《授经图》20 卷）。其成果若按通史和断代史区分，前者流传较广的有清人皮锡瑞的《经学历史》（有中华书局出版周予同注释本等）、近人马宗霍的《中国经学史》（有上海书店 1984 年影印本等）、今人吴雁南等《中国经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 年）和姜广辉等《中国经学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另有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上海文艺出版社）、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以及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学生书局）、甘鹏云《经学源流

考》(广文书局)、李威熊《中国经学发展史论》(文史哲出版社)、日本人安井小太郎等《经学史》(林庆彰、连清吉译,万卷楼图书公司)、日本人本田成之《中国经学史》(孙俚工译,广文书局)等。流传较广的经学断代史类著作有章权才的《两汉经学史》(万卷楼图书公司)、王葆玟的《西汉经学源流》(东大图书公司)、洪乾祐的《汉代经学史》(国彰出版社)、程元敏的《三国蜀经学》(学生书局)、汪惠敏的《三国时代之经学研究》(汉京文化事业公司)、汪惠敏的《南北朝经学初探》(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章权才的《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汪惠敏的《宋代经学之研究》(台湾师大书苑)、章权才的《宋明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吴雁南主编的《清代经学史通论》(云南大学出版社)、李新霖的《清代经今文学述》(台湾师大国研所硕士论文)、田汉云的《中国近代经学史》(三秦出版社)等。

这些著述各有优长,但是也有一个共同的缺陷,那就是像姜广辉研究员批评皮锡瑞《经学历史》和马宗霍《中国经学史》时所说的那样,“此类著作的基本资料和问题意识来自于正史中的《儒林传》以及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朱彝尊的《经义考》等”(国际儒学联合会网,2006年1月20日登载姜广辉《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基础研究资料的选取面失之过窄。这不能过分责怪他们,在不能使用电子检索的时代,单凭作者一个人或者十几个人,要处理数以千万计的基础研究资料,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的。

但是,任何学术问题的研究都应建立在最充分地占有最广泛的研究资料的基础上,才能全面而不偏颇、深入而不肤浅。要想写出一套真实反映中国经学历史面貌和规律走向的《中国经学通史》,必须首先从梳理数以千万计的基础研究资料入手。这种梳理工作历代都有人在做,其成果如简博贤有《今存三国两晋经学遗籍考》(三民书局)、《今存南北朝经学遗籍考》(黎明文化事业公司)、《今存唐代经学遗籍考》(台湾师大国研所硕士论文)等。但是,现今还没有一种全面系统地概括这类基础研究资料的著作问世。

上个世纪末,我曾约庄大钧、王承略、刘心明、宋开玉、刘保贞等

同仁合作撰著六卷本《中国经学通史》。着手撰写时,大家共同的感觉是难以在创新性方面超越前代著说。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于基础资料掌握不全。于是决定先从经学学术资料编年入手。2005年,为了促进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科研工作的开展,时任院长的王学典教授主持策划了4个重点项目、18个一般项目作为研究院科研课题,《中国经学学术编年》被列为重点项目。

经学编年这种形式,可以细致真实地表现某朝、某代、某时、某地的经学流派、经生经师、经学传承、经学著述、经学思想、经学主潮的面貌,并通过由点及线、由线及面的系联方式,来反映某时、某地、某朝、某代的主导学术著述、主导学术思想、主导学术思潮的发展、变化,以为今后撰写多卷本《中国经学通史》提供研究基础。而当今电子检索手段,又为我们处理经学史基础研究资料众多与时间短、人手少的矛盾,提供了解决路径。

《中国经学学术编年》以时间为经,以相关传世文献资料和出土资料的编排为纬,以编年形式来全面反映西周至清末三千年间的经学史面貌和规律走向。其主要内容有五大方面:一、经学著述资料(依据其影响程度分“重点”和“一般”两类,收录时前详后略),如儒家原典的萌生、经典化过程资料,及其后历代注经解经乃至改经的著作提要等,含经书校刻、流布等资料;二、经生经师资料(亦依其影响程度分“重点”和“一般”两级收录),如经生经师的生平大事、性格思想、师法家法,以及经学传授系统等资料;三、经学事件资料,如历代王朝的经学政策诏令、“焚书坑儒”之类历史事件资料,特别是历次古今文经学斗争等资料,并含礼乐制度、馆阁校书、科举、书院等资料;四、经学思潮资料:在上述资料之外的可反映历代经学思潮的资料和反映经生经师学术思想的资料;五、经学背景资料:与经学相关的各朝各代政治、经济、文化、风俗、民情等资料。

《中国经学学术编年》的编写形式为:按朝代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辽金元”、“明代”、“清代”8卷,卷下分年(标出帝王年号、干支纪年、公元纪年),年下按月份为序

排列各条资料,各条先列月份和题目(题目要概括其下的文献原文大意),后有文献原文摘录(类似文献用“互见法”),再后是考论(有必要考订年代、考察事件或人物思想时),最后是后人“相关研究论著举目”。其中,“文献原文摘录”是重点,每条必不可少。

全书分工撰著,各卷进度不一。陆续交稿后,我在审读前,先请某些同学校核文献原文,并将所用文献版本(见各卷后《主要参考书目》)的页码标注出来,便于读者使用。今年春天,最晚一卷稿子交来。全部8卷稿成,郭森、殷仁允同学在体例统一及抽核文献方面付出了很多心力。至今审读编辑完成,交凤凰出版社出版。请同仁们在使用时多加批评,以利于改进。

郑杰文 2011年7月17日撰
2014年12月27日补

编纂凡例

一 收录内容

(一)《中国经学学术编年》以时间为经,以相关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编排、考证为纬,以学术编年形式来全面反映西周初年至清末(1911)三千年间的经学历史面貌。

(二)《中国经学学术编年》收录的主要内容含五大方面:

1. 经学著述资料(收录详略,依据其影响性大小分详、略二级),如儒家原典的萌生、经典化过程,及其后历代注经、解经乃至改经的资料(含经书校刻流布资料)等。

2. 经学人物资料(收录详略,依据其重要性大小分详、中、略三级),如经生经师的生平大事、思想性格、师法家法,以及经学传授系统等。

3. 经学事件资料,如历代王朝的经学政策资料、“焚书坑儒”之类历史事件资料,特别是历次古今文经学斗争资料,以及礼乐制度、馆阁校书、科举、书院资料等。

4. 经学思潮资料:上述资料之外的可反映历代经学思潮的资料和反映经生经师在此经学思潮下产生的学术思想的资料。

5. 经学背景资料:与经学相关的各朝各代政治、经济、文化、风俗、民情等资料。

(三)《中国经学学术编年》的收录重点是经学著作、经学人物、经学事件的原始文献资料。

二 编录形式

(一)《中国经学学术编年》按朝代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辽金元”、“明代”、“清代”八卷。

(二)《中国经学学术编年》各卷以“二级历史分期”为卷下一级目录,如《秦汉卷》下分《秦代经学学术编年》、《西汉经学学术编年》、《东汉经学学术编年》;以“帝王年号、甲子纪年、公元纪年”为二级目录;以事件条目为三级目录。

(三)每卷先列本卷目录,次为正文,后有附录(除依据书名首字笔划为序附录本卷所用书目、版本外,还依据各卷情况附录无法编年的、却富有参考价值的经学资料,如先秦之“出土文献”,秦汉之“纬书所见秦汉经学学术”。

(四)每卷正文分年(标出帝王年号、甲子纪年、公元纪年)编排;年下按月份排列各条编年资料(无月份者排在此年之月份资料后)。

(五)每条编年的结构为:先列月份和题目(题目要概括其条文献大意),后有文献原文摘录(在索引文献之书名和篇目后标出所选版本的页码),再后是“考论”(有必要时),最后是近现代“相关论著举目”。

(六)“文献原文摘录”是每条编年资料的重点,先录最早出现者,后录后世有新见者,其它相似内容之文献的处理用“互见法”。

(七)“考论”主要考辨著作或事件之疑年,或发表针对本条编年人物的思想或著述的新见解等。

(八)近现代“相关论著举目”收录与此条资料相关的近现代论著目录。

三 【文献】及【考论】所定通用版本

为保证全书各卷体例统一,特规定【文献】及【考论】中引用频率

高的古文献之通用版本如下：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1980 年影世界书局缩印阮元十三经注疏本。

“二十四史”，中华书局点校本。

《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点校本。

《太平御览》，李昉等，中华书局 1960 年影涵芬楼影宋本。

《艺文类聚》，欧阳询，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新 1 版整理本。

《经典释文》，陆德明，中华书局 1983 年影印本。

《北堂书钞》，中国书店 1989 年影印光绪十四年（1888）南海孔氏刊本。

《初学记》，徐坚，中华书局 1962 年版整理本。

《文选》，萧统，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整理本。

《四库全书》，影印文渊阁本。

《四库全书总目》，纪昀等，中华书局 1987 年整理本。

前言

1644年6月，满族权贵进据北京，建立清朝，由此开启了二百余年的历史。清代的历史虽不甚长，但其经济、文化则取得过相当辉煌的成就。以经学方面而论，清代的经学成就早就得到了学者们的高度评价。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誉之为“经学的复盛时代”，周予同则认为清代学术“非汉非宋，自成一派”，并名之为“清学”。清代经学研究中出现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惠栋、戴震、纪昀、章学诚、康有为、章太炎等众多著名经学家，他们钩沉索隐，对群经诸史进行深入地考辨和疏证，其成就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汉唐。清代经学成就显著，对于清代经学的研究也由来已久，清代中期的著名学者江藩已经有意识地对本朝的学术状况进行过较为系统的总结。此外，中外的学者们也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的形式，对清代经学的特点和成就作出了研究和阐述，已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然而，迄今为止，对整个清代经学进行编年研究的著作则尚不多见。清代经学对前代经学具有一定的继承性，同时也具有自己的发展和演变规律。对清代的经学历史上的人物、事件、著作等要素进行编年，有助于我们更深入、更细致地认识它的特点和规律。

一

清代的经学成就奠基于清初，清初经学在兵燹之后得到快速的恢复和发展，其根本原因当然是社会历史发展和学术自身积累的必然结果。此外，就具体的原因而论，清初经学的发展又是朝臣、帝王以及遗民学者们共同推助的结果。

清朝定鼎之初，很多朝臣乃至朝廷重臣就积极呼吁朝廷尊孔读

经。据《顺治实录》记载,顺治元年十月初二日,清廷应允了山东巡抚方大猷以孔子六十五代孙孔允植袭封衍圣公之奏,户科给事中郝杰在此日也奏言应及时“开经筵”、“祀阙里”。根据《清实录》记载,自顺治二年至顺治十二年,不断有大臣进言应“及时”讲求儒家经典,如顺治二年三月,大学士冯铨、洪承畴奏请择满汉词臣及时进讲汉文及六经,并对顺治以金世宗、元世祖相期许;同年八月初一日,礼科给事中梁维本又奏开经筵。此外,康熙五年二月、九年三月、九年四月、九年十月、十年七月、十二年正月,朝臣们为“日讲”、“经筵”等事不断进谏,为兴复儒学不遗余力。可以说,清初经学能得到快速的发展,这当然离不开朝臣们的努力。

在此过程中,顺治和康熙,尤其是康熙,做出了重要贡献。顺治是清朝入主中原的首位皇帝,由于享国日浅,朝臣的进谏有不少以“报闻”而终结,并没有真正得到实行。较之顺治,康熙在经学发展中作用尤大。总体来看,康熙在经学发展方面的举措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注重身体而力行。与顺治时朝臣们反复上疏谏行“日讲”、“经筵”不同,康熙时朝臣们进谏虽少,但君臣践履较多。据《康熙实录》记载,康熙几乎每年都有规律地举行“经筵”,几十年如一日,与大臣们研讨经学典籍。特别是康熙十六年五月初四日举行经筵时,康熙改变了经筵仅由讲官敷陈讲章的现象,决定此后举行经筵时君臣互相阐发。另外,此年五月十八日,他又晓谕讲官们学问之道在于躬行实践。康熙反复告诫群臣不能只泥章句、徒肆议论,应该身体力行。虽然他提倡的“圣学”“正学”仍然以程朱理学为本,但他对“实践”的强调明显具有经世致用的倾向,符合了社会发展的要求。二是亲自参与经籍编订并支持开书局修书。康熙在向学之余与讲官们编订了大量经学典籍,他支持徐乾学、李光地、陈廷敬等朝廷重臣开设书局,编修图书,其中《孝经衍义》《日讲书经解义》《日讲易经解义》《通鉴纲目》《周易折中》《康熙字典》《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御制朱子全书》等重要著作在他生前已得到刊行,这也大大促进了经学的发展。其三,康熙大力表彰儒臣,注重推举山林隐逸。为恢宏文治,康

熙重视表彰儒先,曾多次下令推举山林隐逸及遗民学者。康熙九年,朝廷准许了程颢、程颐等人后裔世袭五经博士之职。康熙十七年,康熙颁谕吏部命荐举博学鸿儒,顾炎武、傅山、黄宗羲、孙奇逢等人都曾被人荐举,康熙每每以遗民学者们不就选而致叹。对当时的博学之士时,康熙也时加劝勉和奖励,张英、高士奇、阎若璩、胡渭等人都得到了他的奖谕。此外,他注重通过科举手段进行引导,如以“如何倡明正学”为考题、准许八旗宗室子弟与满洲诸生应试等,这对于经学的昌盛也起到推动作用。当然,康熙并非普通的学者,他的一些举措也并非专为经学而行,但身为帝王而支持经学的发展,其作用却不可低估。

顺治、康熙年间还活跃着一批遗民学者,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李因笃、张尔岐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多憾于明代灭亡的惨痛教训,力矫明中叶以来学术上的空疏之弊,以兴太平、济世务为追求,这与当时朝廷的主张并不违背,应该说与朝廷一道主导了经世致用之风的形成。另外,他们对学术方法的探寻开启了乾嘉汉学之先声。特别是顾炎武,对于后世的影响尤其深远。顾氏精于音韵之学,他主张“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康熙朝重臣李光地就从他那里习闻了音韵学之理,李清植在《文贞公年谱》对二者在学术上渊源关系有明确记载。李光地晚年有不少音韵学之作,这与他受顾氏的影响密切相关。顾炎武、黄宗羲等学者们在经学研究中提出了许多进步思想,深深影响了清代中后期的学术发展,为清代乾嘉时期经学的辉煌导夫先路。

二

真正体现清代经学特点的是清代中期的乾嘉学派,这个时期的学者们重视考据,讲究实证,反对空谈义理,体现出清代经学的最高成就。就乾嘉学派的形成原因来说,这既是学术自身的承传,也是当时学术气氛影响的结果。

首先,乾嘉学派的形成是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治学方法、学术理念延伸的结果。由于顺治、康熙两朝具有相对良好的学术氛围,顾、黄等博通之士的治学方法、学术理念得到比较自觉地传承和弘扬。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有戴震、钱大昕、赵翼、王鸣盛、王念孙、王引之、阮元等人,他们多重视音韵,讲究博通,不同程度地受到顾、黄等人的影响,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说到:“其时学术重要潮流,约有四支:一阎百诗、胡东樵一派,承顾、黄之绪,直接开后来乾嘉学派。”“亭林的著述,若论专精完整,自然比不上后人。若论方面之多,气象规模之大,则乾嘉诸老,恐无人能出其右。要而论之,清代的许多学术,都由亭林发其端,而后人衍其绪。”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故治音韵为通经之钥,而通经为明道之资。明道即所以救世。亭林之意如是。乾嘉考证学即本此推衍,以考文、知音之工夫治经,即以治经工夫明道,诚可谓亭林宗传。”可以说,乾嘉学派虽然在清代中期大放异彩,其根学术渊源则可以追溯到清初,体现着对清初治学精神的传承与发展。

第二,清廷在科举、讲学等事务中有意将经学内容引向“经注”,也促进了乾嘉学风的形成。康熙晚年已经对“以理学自任”的现象进行警示,据《康熙实录》记载,他在康熙五十四年十一月曾告诫朝臣说:“若以理学自任,必至执滞己见,所累者多……凡人读书宜身体力行,空言无益也。”相比较而言,康熙时朝政较宽厚,雍正、乾隆时朝廷控制学风的手段则比较严苛,如雍正二年三月初一日,雍正至太学讲学时要求太学诸生“必期于世道文教有益,不蹈一切虚文”。雍正十年七月二十八日,他又要求科举所拔之文须“雅正清真、理法兼备”。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三日,针对办理船厂事务给事中赵殿最条奏中“船厂地方应建造学校,令满汉子弟读书考试”之说,雍正坚决否定了此奏,并且颁旨命宁古塔等地满洲子弟“勿但崇尚文艺”,以敦勉“满洲本习”,这与康熙鼓励宗室及八旗子弟参加科举的作法大为相背。雍正十三年十月十六日,乾隆颁谕命“厘正文体,勿得避忌”;乾隆五年八月十六日,他要求经筵讲官“勿尚铺张溢美之虚文”。与不尚“虚

文”相适应,朝廷加重了经学、经注在科举考试、人才荐举等事务中的份量。乾隆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朝廷明令要求殿试策文须“贯穿古今、陶铸经史”;乾隆八年六月初一日,乾隆对御史陈仁考试翰詹时宜试以“经学注疏及全史原委”之奏甚为赞赏。尤其是乾隆二十三年三月十日,清廷决定采取庄存与的奏请,要求“取士经旨悉遵用先儒传注”,“私心自用及泥俗讲者概不录”。通过一系列的措施,经学复古更为深入人心。

第三,雍正、乾隆二朝的修书举措也有利于乾嘉学风的发展。在经书编撰方面,雍正、乾隆两朝花费了不少力气。除了效法康熙,将一些日讲及经筵讲章编撰成书外,乾隆在访求“遗书”方面与康熙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乾隆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朝廷应允了御史王应彩访求经学遗书之奏;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乾隆颁谕命购访古今遗书;特别是自乾隆三十八年始,乾隆受安徽学政朱筠的启发,决定在整理《永乐大典》的基础上编辑《四库全书》。在搜求遗书的过程中,不少异本、秘本得以广泛流传,这也为乾嘉学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乾嘉学派按其学术旨趣可分为不同派别,盛期的乾嘉学派往往被区分为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虽然学者们的研究偏重有不同,但大都注重音韵、文字、训诂等方面知识的运用,讲究实事求是,无征不信,这不仅矫正了宋明以来理学家们的空疏学风,而且有效剥离了理学家们强加在经学上的悖谬之义,有助于复原古籍的含义。特别是皖派的代表人物戴震,他在《孟子字义疏证》中对“以理杀人”的现象进行了深刻揭示,这一光辉的思想揭示了封建礼教的虚伪,具有强烈的创新意义。当然,当时也有不少学者确实以诂订为学问,考证琐屑。但总体来看,乾嘉学者在学术研究上事实上走着“以复古为创新”之路。

三

嘉庆、道光以后,清朝的各种危机趋于凸显。一方面,吏治腐败,社会贫困化加剧,社会阶层对立加大,武装暴动、民众起义频发。另一方面,西方列强为打开中国的大门,多次挑起与中国的战争,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00年的八国联军入侵,清政府屡战屡败,丧权辱国,中国社会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内忧外患双重压力之下,经学研究也发生着新变化。这一时期的经学主要表现为今文经学的兴盛、乾嘉学风的回响以及理学家们在中体西用方面的探索。

由于深重的社会危机以及乾嘉学风存在脱离社会现实的倾向,不少学者再一次激发起了经世致用的热情,这也直接诱发了今文经学的兴盛。较早从事今文经学研究的著名学者有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宋翔凤、凌曙等人。孔广森曾师事戴震,也深受庄存与的影响,他综览历代治《春秋》之书,又兼采《左》《谷》之义,于乾隆四十八年前后撰成《春秋公羊通义》,以深入阐发《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之旨,从中寄托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刘逢禄、宋翔凤等人不着重于考证训诂,而是着眼于经世致用之学,重视发挥经传中的微言大义,在当时的学术界扭转了一时的风气。在庄存与、刘逢禄等常州派学者的张扬下,研究今文经学的学者们在社会问题批判和社会制度改良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皮锡瑞、廖平等人就是其中的杰出者。他们关注现实,主张变易,倡议并推动社会改革。特别是康有为,为变法维新积极奔走,在民族危亡的时代里唱出了时代的强音。

道光、咸丰以后,有不少学者继承乾嘉学者们的治学方法,著名者有陈奂、俞樾、黄以周、孙诒让、王先谦、章太炎等人。他们大多博涉经史,不执门户之见,汉宋兼采,在学术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理学在晚清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复兴。推崇理学的著名人物主要